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第一章 亚洲

日本发展的制约

经过几年的发展和演变，多极化战略格局的轮廓已经逐渐显现出来。变动中的国际形势既为日本提高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压力和制约。从近年来日本为调整对外战略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来看，其战略实施的策略和手段表现出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趋向。这种新趋向概括说来就是：在力争维护和巩固国际经济竞争力的同时，更注重将经济、科技、金融优势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积极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继续保持与美国的结盟关系，但对外战略由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变，更注重外交的“独立性”，并在不脱离西方的前提下，注重增强在亚洲的存在，企图构筑一个牢固的战略依托。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日本的外交战略也存在着种种制约因素，自身的弱点和并不乐观的外部环境影响着日本对外战略调整的效果，并将制约日本在国际间的作用。如果我们过分强调日本外交日趋活跃的一面，而忽视日本受到局限甚至是严重局限的另一面，就不能准确判断日本在亚太地区乃至整个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及长远趋势。日本受到的制约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日本不能正视和反省其侵略历史，严重伤害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从而必然会影响到日本在国际上政治作用的发挥。日本在二战期间参加法西斯集团，发动了侵略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的战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在战争中，日本给被侵略国造成了空前的伤害，亚洲国家至今对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行为记忆犹新，担心日本重新走帝国主义的道路，就是西方国家也对日本余悸未消。然而，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朝野上下都有人竭力宣扬所谓的新民族主义思潮，即新大和民族主义，这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做理论上的准备，日本要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同时又在快速发展军事力量，这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事实说明，日本过于专注眼前的利益，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这就难怪亚洲许多国家对日本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从历史教训看，人们有理由担心日本在亚洲的作用过分增强，这无疑将影响日本政治大国地位的确立和作用的发挥。我们甚至还可以这样认为，日本的军事实力提高得越快，在政治上越难以得到其他国家的信任。

第二，日本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复杂，至少在短期内难以在国际体系中定位，因而日本对外战略的选择依然存在许多矛盾。冷战时期，受全球两极尖锐对峙的战略格局的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安全利益在各国的对外战略中占据着中心位置。在制定对外战略的过程中，各国均将安全作为最优先考虑的问题，而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居于次要地位。日本虽然也是如此，但却有明显的特殊性。日本作为战败国，二战给他的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实力被严重地削弱了。日本借助美国的核保护伞和军事保护，主要依靠“外力”就使得安全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得以比较专心致志地发展经济，经济实力迅速提高。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日本才逐渐有可能在对外关系上尤其是经贸关系上向美国显示强硬姿态。当时，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关系尤其是政治利益关系是比较简单的。它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政治和安全上基本是同盟关系，可以说政治安全利益是基本一致的，这种政治安全领域

利益的一致还延伸到经济领域，虽然在冷战结束前，日本与美国、西欧存在一些经济磨擦，但并不突出，在此期间，日本与苏联和周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安全冲突占主要地位，这也影响到相互间经济关系的发展，即使对双方都有利的经济交往也受到很大的限制。苏联剧变，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日本在未来国际关系中的定位还未确定。由于失去了苏联这个“共同敌人”，日本同盟国之间的关系开始松懈，一些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由于日本的跨国资本表现出较强的扩张实力，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冲突上升，冷战时被一定程度掩盖的文化差异也发挥了作用。面对国际社会的各种问题，日本与欧洲进行合作已经越来越重要，但贸易不平衡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俄罗斯虽然不同于过去的苏联，但与日本之间还遗留一个北方领土问题，随着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解决的难度也将增大。日本认为，与中国保持良好稳定的关系不仅对两国、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都极为重要。但是在一些日本人中对中国的防范心理仍然存在，认为“中国对日本来说至少是在未来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又认为“如果美国准备对付”（中国的威胁），“日美安全体制的说服力就进一步增强”。美日重新确认和加强两国安全同盟，反映出面对迅速发展多极化局势，这两国在安全战略上的合作和协调仍然是今后一段时期内两国关系的主要方面，但从长远看，美日两国在国家战略方面上存在着矛盾。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最终要同美国的“领导者地位”发生冲突，日本要实现独立的外交就不可能长期追随美国，而一旦日本摆脱美国的束缚，美日矛盾必然上升，从而将影响到美日同盟的命运。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日本的“独立性”外交是否会做到真正独立。这里不仅是外交独立性问题。日本力图在不脱离西方的前提下，逐渐把对外战略的重心转向亚洲地区，但问题是做到这一点也是非常困难的。不注重亚洲，就没有战略依托，而要向亚洲倾斜，除了历史因素的局限外，日本还有其他苦衷。在许多领域日本有求于西方，它在北美和欧洲拥有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这就解释了日本为何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日趋发展的情况下，却对在亚洲地区建立排他性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不积极。实际上，日本把亚太地区看作决定它政治经济发展前景的关键性地区的同时，从来不敢怠慢同美国的关系，近来又反复强调巩固和发展同欧洲的关系，在政治上，为了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日本不会仅仅限于在亚洲地区的联合。经过二战结束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超级大国，与此同时，也成为世界头号债权国和对外援助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使得日本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日本要想成为政治大国进而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需要国际社会尤其是各大国的支持。而概括起来，由于日本“东西方不分”的模糊地位和历史遗留问题等因素，也由于日本的利益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在矛盾性，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关系中矛盾与协调的两重性比较突出，并将使其对外战略中原来就存在的比较强的不定性更加突出。

第三，日本经济实力虽然强大，但又存在一些明显的、无法摆脱的脆弱性；从长远来看，国际经济固有的运行规律对它的制约尤其不可忽视，并最终将影响到日本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尽管日本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但日本经济本身具有脆弱性，决定了它对外部存在很大的依赖性，日本历届政府都依靠对外政策力求弥补经济的脆弱性，但终究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

以上三方面将制约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是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进行“独立性外交”所难以摆脱的制约。

新时期朝鲜半岛新秩序

在冷战期间，朝鲜半岛是东西方对抗的一个重要战场，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越级大国争夺的对象，朝鲜半岛上的“三八线”划出了两个社会性质相异的两个国家，成为东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界线，而在冷战后，由于东欧剧变，德国统一，苏联解体，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东德与资本主义性质的西德统一，更加引起了人们对朝鲜半岛的注意，一时间，朝鲜半岛二个国家合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北朝鲜和南朝鲜合并成了国际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然而朝鲜半岛的未来发展还不确定。

冷战结束后，美国、日本、俄罗斯三国相继调整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他们的共同点是三国都希望保持半岛稳定，实现无核化，防止战争，促进南北对话，缓和紧张局势，但是实质上三国从各自的战略利益考虑又有不同的目标和打算。

首先，我们来说说美国，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失去了苏联这一强有力的对手，美国更想独霸朝鲜半岛，企图主导朝鲜半岛新秩序。

冷战后，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政策的特点最初是“战略收缩”，但是现时期已转为“主导新秩序”。美国在布什总统时期的政策目标主要是强调：鼓励南北对话，建立信赖，缓和政治和军事紧张局势，减少驻韩国（南朝鲜）的美军，并逐步将美国在韩国国防中的“主导作用”转为“支援作用”。但在克林顿上台后，这些内容都被修改了，在美国《东亚战略报告》中有所体现：强调要保持在韩国的驻军，继续增强韩国军队的防御能力，适当地让韩国分担防御费用，普及民主主义，“保护人权”。由此可见，冷战以后，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中心已经由一开始的优先注重经济利益，而扩展为同时注重经济、外交和安全利益，并且显示出了美国不但无意退出朝鲜半岛，还要全面参与半岛事务，主导构筑新秩序。

美国为了进一步确立“主导地位”，选择了相应的“弹性”措施。对朝鲜采取“软着陆”政策，美国认为，朝鲜是一个“越打越硬”的国家，和朝鲜打交道不能采取对待伊拉克的硬打的方式，应该通过接触和对话使他“软着陆”逐步被国际社会接纳，为此。美国现总统克林顿在对朝鲜的政策上，体现了相当的灵活性，比如我们所知道的1994年美国以和平方式同朝鲜签订了核框架协议，1995年在纽约正式签署轻水堆供货协定，同时美国还动员国际社会向朝鲜提供了救灾粮食和物资，这些举动对改善美国和朝鲜的关系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韩国，美国做出象征性的“放权”，让韩国分担责任。美国为逃避国际谴责，减少美国对韩国的主导色彩，美国将韩国军少将任命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军事停战委员会首席代表，任命韩国军人为韩美联合司令部陆军司令，还将平时作战权移交给了韩国，并让韩国承担70%以上的资金，帮助美国履行“朝美核框架协议”。这些作法充分体现了美国在东亚的战略精神实质，即借用盟国力量实现美国利益。

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是他国家利益的需要。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快、最活跃的地区，有着美好的发展前景，美国对亚太地区的依存程度

已经超过了欧洲市场的依赖。因此美国需要保持亚太地区的稳定，克服朝鲜半岛的不稳定因素，否则将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利益，失去美国在不久后亚太时代到来之时的有利地位，同时美国也是“防止日本、中国坐大”。面对中国国力的增强和日本在政治、军事方面“大国意识”的膨胀，美国担心其在半岛上的既得利益受到破坏，所以采取灵活措施，加强美国在半岛的地位和影响力，再者，美国想维持他主导的世界核秩序。通过缓和同朝鲜的关系，防止朝鲜核问题带来不良反应，危及美国安全。

美国当局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将继续加强同韩国的同盟关系，虽然磨擦因素会有所增加，但不会动摇。而且美国不可能彻底解决朝鲜半岛“冷战遗留问题”，它可能采取“治病不除根”的办法，否则，美就找不到留在半岛的原因，并失去一个军火销售市场，失去许多利益。

其次我们说日本，日本对朝鲜半岛占有地利的优势，当然不会放弃从朝鲜半岛上捞点油水。日本对朝鲜半岛采取的主要政策是跟随美国，伺机捞取实惠。

冷战后，日本积极推行“两个朝鲜”政策，但是由于受到美国与朝鲜的牵制而不得不放慢速度，跟随美国。日本不放弃同朝接触和对话的机遇，配合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部署，为朝鲜提供救灾援助，1996年4月17日，日本同美国发表了《美国安全保障宣言》，这意味着日本在“朝鲜半岛有事时”，可以行使他的“自卫权”，从而使日本在半岛的作用已不再仅限于经济范畴，明显看出，日本在配合美国的同时，自己也捞到了不少好处。

虽然日本的对半岛政策受到牵制，但他承认“两个朝鲜”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在安全上，日本一向视朝鲜半岛为通往俄罗斯、中国的跳板，阻止大陆势力威胁的堤坝，冷战后日本认为保持“日韩伙伴关系”，改善日朝关系，可以使半岛稳定，以确保日本的安全。在外交上，日本想成为政治大国。推行“两个朝鲜”政策，来扩大日本在半岛上的发言权，维持半岛分裂现状，防止半岛统一后飞速发展，成为第二个“日本”，与他竞争。经济上朝鲜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特殊的矿藏，日希望能够长期渔利朝鲜。

日本今后将根据美朝关系的进展来调整日朝关系改善步伐，以“接触而不结果”的方式处理日朝关系，今后可能增加对朝援助，在军事上日本会坚守“美日韩共助体制”。在军事上继续支持美、韩立场，日本绝不在经济上向韩国让步，两国的贸易磨擦不会根本解决。

最后我们谈一下俄罗斯对朝鲜半岛问题的打算。俄罗斯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国，当然不会放弃在半岛问题上的发言权，企图恢复往日雄风。

自俄罗斯与韩国建交以后，曾一度采取“对韩一边倒政策”。1994年叶利钦总统提出“要恢复强大俄国”的地位，从此俄罗斯便开始对朝鲜半岛实行“等距离外交”。一方面努力恢复俄朝关系，继续加强同韩国的军事关系，同时俄罗斯试图以“不偏不倚”的姿态参与朝鲜半岛事务，试图以“不同的声音”区别于其他对朝鲜半岛事务的看法，突出俄罗斯的影响和作用。

尽管俄罗斯做出了一定努力，但依据内外形势的分析，至少在本世纪内，俄罗斯在朝鲜半岛恢复大国地位的可能性不大，主要原因是，俄国尚未恢复元气，综合国力不强，外交上缺少号召力，而且朝鲜对俄罗斯信赖程度下降，美国也会牵制俄罗斯在朝鲜半岛“称雄”。不过，从长远角度看，俄罗斯的力量我们不可忽视。首先，俄罗斯仍是一个军事大国，有雄厚的高技术和资

源基础，潜力很大，其次，过去朝鲜在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较大，再者俄如果能走向政治稳定，经济得到根本好转，韩国为克服对美一边倒的政策，会进一步加强同俄的军事合作，扩大双方的合作关系，进而又提高了俄罗斯的作用。最后，俄罗斯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表决权，朝鲜和韩国都不会忽视俄罗斯的这一作用。

总之，冷战后，朝鲜半岛的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日本、俄罗斯都想要在要建立的新秩序中确立有利位置，扩大自身影响。当前，在半岛的秩序上，“美国主导、日本跟随、俄罗斯想称雄”的特点已显露出来，而且会持续一段时间，但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他们都不可能圆满实现战略考虑，因为他们的部分政策会受到朝鲜、韩国“自主意识”的抵制，三国之间也会相互牵制、暗中作梗。

冷战后东盟的发展

东盟，也就是东南亚国家联盟，它作为东南亚国家的区域性组织，一方面正在成为东南亚各国凝聚在一起的核心力量，并在东南亚地区的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又以地区国际组织的形式来处理与主要大国和有关国际组织的关系，从而凭着它特殊的地位影响着亚太地区形势和政治格局的变化。随着东盟扩展到东南亚十国，东盟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将进一步增强，东盟内部的团结与稳定和对外政策的走向也将对亚太地区的形势产生重要影响。一个稳定而中立的东盟将是亚太地区甚至是全世界保持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

1968年8月8日，印尼、菲律宾、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五国在曼谷发表宣言，组成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曼谷宣言》表明该组织的目的在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以后，东盟在政治上一再重申建立“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目标，并明确东盟国家间的军事合作只在非东盟的基础上进行，也就是东盟国家联合一致对外。然而，冷战时期美苏对峙以及印度支那地区存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东盟是难以实现建立中立区的目标的。冷战结束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峙情况的消失，一方面使大国干预东南亚地区事务失去理由说辞，而且大国对东南亚地区内事务的影响力也随着减小，另一方面，也使印支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东南亚进入相对的和平时期。这种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为东盟在东南亚地区扮演政治主角创造了时机与条件。东盟从参与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开始，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政治、经济活动逐渐地占据了对东南亚地区事务的主导作用。1995年的第五届东盟首脑会议是冷战后东盟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意接受柬埔寨、老挝、缅甸于2000年前加入东盟，将东南亚组成一个共同体，形成一个大东盟，接收印度为对话伙伴，开始着手一些经济合作，会议的成果一方面表明东盟自身经济与政治合作的加强和力量的壮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东盟对地区的影响力也在增强。

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政治实力的加强使东盟在东南亚地区具有日益增强的中心吸引作用。进行区域性经济合作始终是东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发展经济是东盟谋求内部政治稳定和增强国际地位的主要手段。随着区域合作的发展和各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东盟在政治上的自主意识更趋强烈。尤其是近几年在人权、民主等一系列问题上抗拒西方大国的强权政治表现得特别

突出，东盟的这些变化对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继越南入盟后，老挝、柬埔寨、缅甸也相继申请加入，对于他们来说，加入东盟不仅可以增强自身的国际政治地位，也意味着在经济上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有着多个有利因素，东盟的这种中心吸引作用，使东盟成为东南亚十国联盟之事指日可待，从而使东盟在东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冷战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消失的情况下，东盟实力的增强和地位的提高对亚太地区形势和格局的变化发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二方面：一是改变了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二是改变了其他大国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关系。今后的东南亚将不再是一盘散沙，由于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有共同的需要，东盟这个政治实体将维持并发展下去，并且以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形态在亚太地区扮演一个独特的角色。东盟现在随着其实力的增强而成为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使亚太地区的以大国关系为主导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它一方面确立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使大国难以插手该地区的事务，另一方面又以自己为中心构成一种大国平衡的格局，同时又在大国之间扮演缓冲，平衡以及调色的角色，同时东盟在处理亚太事务中也引入了互不干涉各国内部事务，平等合作，协商一致的行为准则和方法，这一准则在处理多边国际关系中有利于缓解矛盾，求得共识。这对少数大国的强权政治是一种制约。

冷战后，东盟出现了一种“逆裁军”的现象，同国际裁军大潮背道而驰，并且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东盟国家的扩充军事活动有增无减，已达到某种低强度的或者说是温和的军备竞赛的程度。由于东盟明确地要避免自己成为军事同盟，因此东盟国家的防务力量显得较为分散。东盟这种不搞军事同盟的原则符合其建立“和平、自由、中立区”的宗旨，有利于减少地区性的军事对抗和避免卷入大国间的冲突。同时更促使东盟在政治上加强推行地区多边合作与协商的作法以政治手段谋求安全，东盟国家如何在加强自身防务力量和推动地区多边的安全合作上保持平衡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具有较大影响。

从长远看，东盟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但由于其经济水平有限，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从近期看，东盟的主要目标在于增强自身实力，一致对外，但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发展，受到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经济上虽然经济发展较快，但整体经济水平不高，绝大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而且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相似，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由于这种经济特点，东盟一体化过程将是漫长的，而一体化发展程度的高低必将对东盟政治上的合作及国际地位产生影响。

东盟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合作的稳定有赖于大国关系的相对稳定。东盟在政治上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各国内部面临许多政治问题，如种族矛盾、宗教矛盾等，二是各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距较大，这种特点决定了东盟的政治合作主要在于维护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在许多情况下，政治上的协调与合作是出于共同安全的考虑。同时，东盟这种合作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赖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相对稳定。如果大国之间发生激烈对抗，东盟是否能整体一致坚守中立还是个未知数。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东盟国家内部社会政治稳定性的提高，东盟在亚太地区政治和安全合作中的作用也将进一步增强。

随着东盟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组织规模的扩大，他在东南亚的主导地区已毋庸置疑。作为一个新兴力量，东盟也成为各大国争夺和利用的对象。美国试图利用其特殊的军事地位限制或牵制东盟在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制造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强调安全中的大国力量平衡论，日本则把东盟作为在政治上与美国和中国进行平衡的力量加以利用，与此同时，俄罗斯、欧盟等也把与东盟发展关系作为参与亚太事务的重要途径。

对东盟来说，保持与各大国的平衡关系有利于自身的安全，也有利于地区的稳定，而且这种平衡是积极主动的。东盟这种积极的“以我为主”的大国平衡政策，使其本身也成为大国之间保持平衡的重要影响因素。

总之，冷战结束为东盟的发展提供了良机，东盟实力的增强又使它成为亚太地区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力量。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国际组织，随着其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它在亚太地区的作用也将更受关注，相信一个稳定而中立的东盟将是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保持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

中亚高加索——各大国争夺的焦点

苏联解体后，里海周围的中亚高加索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各种国际势力都想插手该地区事务。特别是近来，随着俄美在北约东扩问题上斗争的暂告平息以及里海地区油气资源开发浪潮的不断升温，美国、俄罗斯等世界大国和土耳其、伊朗等地区势力加紧了在这一地区的争夺，且有愈演愈烈的势头。这种迹象表明，该地区的未来走势和力量对比正在酝酿着深刻变化，它将成为世界战略格局调整的重要环节。

第一，中亚高加索地区地缘战略地位重要，是影响欧亚大陆稳定的重要因素。中亚高加索地区位于欧亚大陆连接处，自古以来就是各种势力竭力染指的战略要地，随着苏联解体后欧亚地缘政治格局的重新构筑，这块处于“权力真空”状态的地区战略地位重新凸现。对美国来说，填补中亚高加索“权力真空”，夺取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不仅可以打通连接北约与美的安全保障同盟的战略通道，实现在欧亚大陆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安全体系的战略部署，还可以以中亚高加索为地缘政治支点，以北约东扩和强化美日同盟为两翼，抑制俄罗斯的复兴，防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扩展，遏制中国的崛起。对俄罗斯来说，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在其对外战略中始终处于重要地位，这一地区的未来走向对俄罗斯来说利益攸关。首先关系到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北约的首轮东扩使俄罗斯在西线丧失了二千公里的战略缓冲，守住独联体这块“阵地”已成为俄与北约关系中最后的“底线”。北约在中亚高加索的渗透如果得手，对俄的安全将会造成直接威胁，这对一贯重视“战略屏障”作用的俄罗斯军事战略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其次，关系到俄罗斯的国家统一。俄罗斯南部北高加索是穆斯林聚居地区，这里车臣战火目前虽已平息，但车臣独立的呼声却不绝于耳，其他地区的冲突也依然不断，俄如不在中亚高加索地区保持影响，无疑就会给分立主义势力提供可乘之机，而俄罗斯的国家统一则将面临现实的威胁。

第二，世界主要政治力量在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利益和矛盾盘根错节，它们在该地区的力量消长，将直接影响到欧亚大陆乃至世界战略格局的未来走向。在中亚高加索地区，东西方文明汇聚，东方文化、伊斯兰文化、斯拉夫

文化在此都有广泛影响。同时，该地区又是世界著名的“冲突链”，纳卡冲突、车臣战争、塔吉克内战此起彼伏，各国潜在的民族纠纷、宗教矛盾和领土争端使该地区局势动荡不安。另外，在这些矛盾、冲突背后都存在着大国角逐的背景，美国加紧向该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渗透，俄罗斯竭力维护在该地区的传统地位，伊朗、土耳其也想在此扩展影响。各国在该地区矛盾交织、利益碰撞不仅将影响中亚高加索的局势，也必将影响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未来欧亚和世界战略格局的构建。

当前，以北约为主导的欧洲安全格局已经初步确定，亚太地区的美日安保同盟也再次得到了加强，在这个大背景下，争夺地缘政治地位十分重要的中亚高加索地区自然成为构筑新的欧亚和世界战略格局的重要环节。近来，这个地区在大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它们各自施展本领，对这一地区展开争夺。中亚和高加索各国也纵横捭阖，展开积极的全方位外交，力图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中亚高加索地区成为世纪之交外交战的新场所。

第一，美国把中亚高加索视为构建以美国为主导的欧亚战略格局的战略通道，开始对中亚高加索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渗透。首先，美国提升中亚高加索地区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出台新中亚战略，苏联解体后，美国最关心的是俄罗斯的走向，对中亚高加索地区没有涉足过深，但是近来，提升中亚高加索地区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制定出对中亚高加索的新战略却成为美国外交决策层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美国认为中亚高加索地区是对美国具有切身重要利益的地区。企图支持这一地区国家对俄罗斯的独立倾向，使该地区成为美国 21 世纪的战略能源基地，遏制并削弱俄罗斯和伊朗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抑制中国的崛起。其次，密切领导人之间的高层接触，提升政治关系。1997 年 7 月，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三国总统相继访问美国，美国表示要加强与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合作，支持两国经济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阿塞拜疆总统的访问，美国总统克林顿多次强调阿塞拜疆是美国的战略伙伴，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使外高加索地区的力量对比有所改观。

第二，俄罗斯把中亚高加索看作自己的“后院”和恢复大国地位的战略基础，竭力维护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首先，俄罗斯利用旧有影响和独联体各种机制强化对该地区的控制。中亚高加索是俄的传统势力范围，尽管这些国家已经独立，但它们仍与俄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上需要借助俄罗斯的力量维持地区平衡，安全上需要俄的扶持，有些国家甚至还需要利用俄军守卫外部边界，经济上也难以脱离与俄罗斯的关系而自主发展。目前，俄在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等国都有驻军，俄还与该地区国家签署了大量内容广泛的双边政治、经济等协定，借以对该地区扩大政治影响。其次，俄罗斯加强调整地区冲突，利用冲突“仲裁者”的身分维持在该地区的战略优势。自苏联解体后，中亚高加索因民族矛盾和领土纠纷等因素而引发的地区冲突不断，前几年，俄在这些冲突中一直扮演着“纵火者”和“消防队”的双重角色，引起有关国家的强烈不满，并使外部势力乘机插手这一地区的冲突调整。近来，俄改变了以往的做法，加强了调解冲突的力度，努力赢得冲突各方的信任，防止外部势力插手。比如在纳卡冲突问题上，俄罗斯改变了过去偏袒亚美尼亚的作法，积极地调停纳卡冲突。在俄罗斯的压力下，亚美尼亚的立场趋于灵活和缓和，表示不再支持纳卡地区的独立要求，承认阿塞拜疆的领土完整。最后，俄罗斯还努力改善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

1997年7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到访的阿塞拜疆总统签署了《俄阿友好合作和相互安全条约》，这使近年来冷淡的俄阿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机，成为“两国关系的新起点”。俄罗斯调整与这几国关系也是有所侧重的，它视亚美尼亚为盟友，把亚美尼亚作为在该地区施加影响的一个基地，对阿塞拜疆实行“怀柔”政策是为了缓和阿塞拜疆向西方靠拢的势头。

第三，其他国际势力也加强对该地区的渗透，谋求政治、经济利益。首先，土耳其积极向该地区扩展势力，力图成为地区强国。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就对中亚高加索地区有着重要影响。随着苏联解体，特别是近来该地区力量的分化调整和大国关系的演变，土耳其以美国和北约为依托，加强了对中亚和高加索的渗透。利用与这一地区国家的传统文化联系进行政治渗透，力图确立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土耳其正积极地筹建“突厥语国家联盟”，吸引中亚高加索的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国参加，推行“土耳其模式”，力图成为突厥语系国家的盟主。其次，伊朗为突破美国对他的“围堵”，进而扩大伊斯兰势力在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影响，也展开了积极的外交行动。在抗衡美国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渗透方面，俄罗斯与伊朗有共同利益，1996年6月，伊朗与俄罗斯发表一项联合公报，称两国将“同里海地区的国家进行合作，以阻止外来势力（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存在”。1997年9月，两国的副外长又进行了会谈，强调双方将在解决地区问题中加强合作。

大国和地区势力向中亚高加索地区的渗透，使原本就不平静的地区局势增加了新的复杂因素。中亚和外高加索各国在大国角逐面前，积极推行全方位外交，力图在大国和地区力量间寻求平衡。阿塞拜疆近来的外交活动表现得最为突出：一方面，它积极向美国靠拢，与美国建立战略军事伙伴，加强与美国在经贸、政治和安全等各领域的合作，另一方面又与俄罗斯签署友好合作和相互安全条约，使两国关系得到改善，同时，它又与土耳其密切接触，结成战略伙伴。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积极在俄罗斯、美国、伊朗、土耳其等国际力量之间谋求平衡。种种综合因素的作用正在使该地区的大国关系和政治走势发生着深刻变化。在新的世界政治新秩序酝酿形成的大背景下，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走势必将对世界战略格局的重新组合产生深远影响。

第二章 欧洲

欧盟在中东的崛起

欧盟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是多极化世界格局中非常重要的一极。在国际事务中，欧盟已经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中东事务中欧盟已不再追随美国，不甘充当配角了。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欧盟与美国之间的摩擦、不和与对抗在不断加剧。与美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和与美国“共同主持中东和平进程”的呼声集中地体现了欧盟重返中东的强烈愿望。欧盟在中东的崛起代表着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它有效地改变着中东地区政治力量失衡的状态。因此，备受世人关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东一直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地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为中东的石油和战略地位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争斗。80年代末，苏联解体。两极世界变成了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单极世界。美国在消除前苏联在中东的势力的同时，大规模地蚕食鲸吞了欧盟的传统利益。欧盟与美国在中东利益上的争斗由此变得表面化、公开化了。这对新的矛盾已经完全取代了原先的东、西方矛盾。面对日益加剧的欧盟与美国间的利益冲突，欧盟审时度势，及时地调整了中东政策，加快了重返中东的战略部署。海湾战争以后，美国增加了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存在，确立了独霸中东的地位。美国采取了“东遏两伊”（伊朗、伊拉克）、“西促和谈”的策略，将欧盟排斥在中东事务之外。欧盟原来打算通过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获取海湾战争的“战利品”，来换取主持“中东和平进程”的一席之地。然而在美国的强行霸道下、以色列的百般阻挠下，欧盟的愿望化为泡影。至此，欧盟觉悟了，不再充当美国中东政治帐单的“付款者”，重新塑造欧盟的高大政治形象，已成为所有欧盟国家的共识。控制中东、制约欧盟、日本和亚洲，继续称霸世界是美国的21世纪战略。美国控制了中东的石油供应，欧盟的经济必将受到美国的潜在制约。美国一方面对一些中东国家比如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限制欧盟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美又将中东经济纳入美国的全球经济范畴之内，试图阻止欧盟“南下”扩展发展空间，通过对欧盟经济的限制来制约其政治的发展，面临咄咄逼人的美国战略和中东政策，欧盟奋起与美国抗衡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

欧盟挑战美国的中东政策，首先，反对美国偏袒以色列。海湾战争之后，美国以“救世主”自居，单独主持中东和平进程。1996年，内塔尼亚胡为首的利库德集团上台执政后，以色列政府否定了巴以双方确定的“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顽固地推行“三不政策”（即不允许巴勒斯坦建国；不谈耶路撒冷最终地位；不放弃戈兰高地主权），并且于1997年批准在东耶路撒冷扩建犹太人定居点。至此中东和平进程停滞，为了维护美以的特殊利益关系和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利益，美国始终没有对批准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企图扼杀中东和平进程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施加过压力。然而，欧盟却一再强调，1993年奥斯陆协议确立的“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是实现中东和平进程的基石，巴以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必须严格遵守。为此，欧盟国家公开谴责以色列政府违背国际法的行径，向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提交了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的提案，然而这个提案遭到了美国的两次否决未能通过。但是，美国的两次否决使得不少阿拉伯国家真正认识了美国的“信誉”和“公

正”。欧盟的提案赢得了阿拉伯国家的高度赞赏，为打破美国独霸中东和平进程，为欧盟在中东地区发挥更多的政治作用创造了有利的时机。

欧盟为重返中东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首先，谋求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主导地位。由于美国与以色列勾结，欧盟一直无法直接参加巴、以双边谈判。但是欧盟从来就不是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局外人”。欧盟利用与中东国家传统的近邻关系，在中东和平进程启动阶段，就为巴、以牵线搭桥，积极促成和介入巴、以秘密谈判。而且欧盟承诺向巴勒斯坦人提供 6 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并邀请阿拉法特访问欧洲。这些十分明确地表明了，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欧盟始终在谋求主导地位。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争端上，欧盟与美国的分歧已呈现出渐渐深化的趋势。欧盟不仅采取同美国有区别甚至对立的政策，而且有日益偏向阿拉伯国家的趋势。在中东和平进程处于停滞，倒退的危机时刻，欧盟代表团两度出访中东，强调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欧盟的进一步作用。法国总统希拉克更是用心良苦，展开了旨在挽救中东和平进程、加强法国、欧盟与阿拉伯国家的传统关系，扩大欧盟的政治影响与作用的外交攻势，以抵消一些美国的霸主行为影响。为了保证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更为积极、独立的外交政策，欧盟向中东地区派遣了特别协调员。这是欧盟决心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实质性行动，也是挑战美国独霸中东和谈的具体步骤，阿拉伯世界认为。“当今的欧盟在中东问题上已不再沉默，开始敢说并且敢做了。其次，欧盟建立“新地中海战略”。“东扩”与“南下”是欧盟面向 21 世纪的重要战略决策，在“东扩”中，人们不难发现有欧盟屈从美国的阴影。然而，“南下”则是欧盟针对美国倡导的中东北非经济合作区，为了自身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与美国争夺地区经济主导权的果敢举措。

自苏联解体退出中东地区后，美国成了中东地区政治、军事的超级霸主，使中东国家陷入极为不利的困境。而对美国一系列高压政策，中东国家期望欧盟迅速崛起，以打破美国独霸中东的局面、美国支持以色列拥有巨大的核武器库，却强烈反对欧盟、俄罗斯向阿拉伯国家、伊朗提供民用的核反应堆技术，这也迫使中东国家进一步倒向欧盟。同时，中东国家与欧盟也是安全的战略伙伴。自然地理将中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亚洲，一部分在非洲。但是，很多阿拉伯高级政治战略学者却认为：依据长远的政治利益、经济互补的需求和远大的发展前景，中东地区应划归到欧洲的政治、经济范畴之内。中东国家与欧盟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经济的交往。而且在苏联崩溃后，面对美国的霸权行径，阿拉伯世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集团，应该寻求与另一极世界力量的合作，而新近崛起的欧盟是最为理想和安全的战略伙伴。中东国家期望战略合作伙伴欧盟“一极”能迅速崛起。

在多极化世界中，欧盟一极在中东事务中重要的政治、经济作用已经日趋明显。欧盟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冲突也日趋激烈。由于美国竭力袒护以色列、制裁两伊（伊朗、伊拉克）的中东政策，大部分中东国家与美国积怨甚深。欧盟利用其有利的地缘政治优势，努力发展与中东国家的全面伙伴关系，赢得了广大中东国家的积极响应。现在欧盟和中东国家都深刻地认识到，为了抵御美国的霸道行径，全面加强双边合作已是欧盟和中东国家共同的战略选择。因此，欧盟在中东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而欧盟在中东的崛起代表着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趋势，有效地改变着中东地区政治力量失衡的状态。而欧盟在未来国际新秩序中的地位也更加重要。

世纪之交的中东走向

中东地区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是举世瞩目的“热点”地区。进入 90 年代后，以海湾战争和 1993 年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平协议两件世界性大事为契机，长期困扰中东各国的紧张局势趋向缓和与稳定。

从总体上看战后几十年中东形势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到，始终起作用并影响着中东局势发展的主要有以下几大因素：

第一，超级大国的相互争夺的战略调整。中东地区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给合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中东地区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民族的和社会的矛盾与纠纷，使各国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给外部势力以可乘之机。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与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更是将中东视为各自全球战略的重点地域。它们或者是建立势力范围，挑动集团间对抗；或是扶植各自的代理人，拉一派打一派，从中获利。战后数十年中东战火不断，危机频繁，究其原因无不与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有关。超级大国间的争夺是影响中东形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地区大国的对外战略影响中东局势发展。中东地区历史上曾产生过无数雄踞广阔的地域，强盛数百年的王朝和帝国。到了近代，中东国家虽然大都沦为英、法等国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但素有反对外来列强侵略传统的阿拉伯民族从未停止过复兴阿拉伯家园的抗争。这一斗争使伊拉克、也门、苏丹、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国先后获得了独立。数十年后，伊朗、伊拉克、埃及等中东国家一直表现出他们要在中东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倾向。中东地区大国群雄并居、盘根错节的关系，是影响中东局势发展的又一因素。

第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以及发展对中东和平起着重要作用。中东的民族、种族、部族、世界等矛盾错综复杂，成为战后世界政治版图“热点中的热点”。但中东问题的核心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矛盾，其实质就是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前途直接影响中东局势的缓和或紧张、战争或和平。战后中东地区发生过十数场大大小小的危机或战争，其中 5 次大规模中东战争都因巴勒斯坦问题而起。事实证明，巴勒斯坦问题一天不得到全面、公正、合理的解决，中东就一天不安宁。因此，巴勒斯坦问题是观察中东时局走向的标尺之一。

随着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大转换，原来影响中东局势的诸多因素处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之中，它们共同作用并推动中东大势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

首先，美国拥有影响中东局势的主导权。随着冷战的结束，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已不能同昔日的苏联相提并论。与美国的影响力相比更是相形见绌。这一根本性的外部力量失衡，使美国可以全面和广泛地介入中东事务，力求使中东局势朝美国愿意看到和认可的方向发展。美国对世纪之交的中东战略目标是建立一个美国主导下的相对稳定的中东。中东仍是冷战后美国谋求主导世界的前沿，与美国利益至关重要。九十年代初，针对世界格局出现的新变化，美国进行了重大的战略调整，在逐步缩减驻欧洲军事力量的同时，增加了在中东的军事存在。美国国防部在报告中明确提出：美国同中东有着盘根错节的重要利害关系。中东是欧洲和地中海同非洲、亚洲和印度之间的空中和海上的交通枢纽。因此，它对美国在全世界进行贸易和投放军事力量起着重要作用。维护中东地区相对稳定的局面，确保美国对中东和平进程的

主导权，是冷战后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方针。从 1993 年巴以和平协议签署后，美国一直以“第三方”身份在尽力推进协议的逐步执行。每当巴以双方在执行协议时出现矛盾或在原来立场上倒退时，美国就运用他占据的主导地位进行调节。同时，美国也确保中东地区各种力量的平衡。积数十年的经验，美国知道在阿拉伯国家中没有美国“真正的盟友”，要确保美国在中东的利益，除坚持一贯的偏袒以色列，强化美以同盟的传统做法外，还要充分利用阿拉伯国家的矛盾。因此，美国对阿拉伯世界一直采取分化和区别对待政策。近年来，美国一方面加紧拉拢阿拉伯国家中“温和势力”如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发展同这些国家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全面关系。另一方面，对与美国唱对台戏持强硬立场的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采取“铁腕政策”进行孤立、封锁和排挤。如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继续对利比亚进行国际性制裁，对伊朗搞颠覆活动等。美国对上述国家的强权政治虽遭到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反对，但美国认为这是防止地区大国势力做大的根本途径。

其次，阿拉伯国家联合、团结愿望有了进一步增强。中东局势有望走出一个较长时期的缓和——对抗——稳定的发展方向，这同近几年来中东国家加强地区合作，增强阿拉伯世界的整体意识不无关系。中东地区除以色列、伊朗、土耳其等国外都是阿拉伯国家，在历史上有相似的遭遇，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民族特性，数十年的阿以矛盾导致阿拉伯世界的四分五裂，但阿拉伯国家追求联合自主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埃及、叙利亚等国一直在谋求阿拉伯世界的团结。这几年来，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和自主迹象更加明显。各国都表明反对外来势力插手和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主张阿拉伯国家的事情由阿拉伯人自己解决。因此，近几年来美国在中东许多问题上碰壁。如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对伊朗搞颠覆活动，就遭到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国的反对。同时阿拉伯各国也相互协调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巴以协定立场上倒退的行径，阿拉伯国家表现出空前团结和一致的立场。1997 年初，当以色列政府准备在东耶路撒冷扩建犹太人定居点，致使阿以矛盾再度激化时，阿拉伯国家通过各种方法，促使联合国在 1997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 10 届紧急特别联大，并且通过了谴责以色列在其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兴建犹太人定居点的决议，使以色列空前孤立。这是海湾战争以来阿拉伯国家首次集体行动，国际影响很大，初步弥补了因海湾战争造成的阿拉伯世界分裂所带来的阿拉伯事业的损失，它是阿拉伯国家走向团结的象征。最后，巴勒斯坦和平进程在曲折中前进，奠定了中东局势朝缓和方向发展的基础。1993 年巴以协议签署后，尽管离全面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目标还很远，但总的趋势是缓和对话。根本一点在于经过数十年的斗争，巴以双方都厌恶战争和暴力，和平已是双方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是时代的要求，大势所趋。尽管执行巴以协议的每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但和平的车轮一直在前进，只要各方真诚努力，巴勒斯坦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同时，以色列与他的主要邻国的关系正常化，也将使中东局势朝好的方向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走向世纪之交的中东将出现较长时期的缓和与稳定时期，因各种条件对和平有利，但是仍存在着影响和平的不利因素。首先是渐成气候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对中东的冲击。中东国家大多信奉伊斯兰教，80 年代以后，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这一块区出现了一股复兴伊斯兰、倡导以伊斯兰文化统一阿拉伯国家的社会思潮。其中一股极端主义势力主张以暴力和恐怖手段来实现目标，他们对内主张推翻政权，对外

排斥外来民族（如犹太族）和外来文化（如西方文化），这种极端主义势力到处挑起事端，制造矛盾，搅乱政治秩序，并且容易被外部势力利用，成为影响中东和平的新的不稳定因素。其次，耶路撒冷的地位之争也是一个不利因素。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共同“圣地”，它的归属和地位一直是悬而难决的问题。1997年年初，以色列执意要在东耶路撒冷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引发了巴以双方紧张对峙的局面。同时，伊斯兰国家也反对以色列的错误行径。后来，虽然经国际社会及有关国际调解，巴以关系紧张的局面有所缓和，但这一事件已经暴露出中东和平的脆弱性。因此，中东各个国家都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携起手来共同努力走向21世纪，开创一个属于中东人民的新纪元。

北约东扩

近两年来，北约东扩的势态发展一直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北约东扩是美苏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中的第一件有着牵动全局意义的大事件，它不仅对当事者，也就是欧洲、美国、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有着重大的影响，也必然会对世界格局未来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在北约东扩的背后，或许冷战结束后世界重新组合的某些新的要素正在形成。

中东欧地区的地位，在战略上是极其重要的，150年来这一地区在安全属性上对世界政治起着关键的影响，这一地区历史上屡次成为大国争霸的抵押品。这一点也构成了北约东扩的战略含义的重要部分。

众所周知，北约东扩是美国关于欧洲安全问题的基本态度，在美国人的战略思想中，北约东扩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于未来发展方向并不确定的俄罗斯起到一定威慑作用，另一方面对欧洲内部的力量分布也是一种约束，美国在北约东扩中的态度是积极的。1989年，针对德国统一的局面，美国布什总统领导的政府提出统一后的德国应是北约组织成员，并在以后始终坚持此原则，可以说，北约“东扩”是从德国统一那一刻起就已开始了，而且美国是始作俑者。

此后，随着华约解散、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美国重新提出北约东扩，并且得到实施。北约作为一个军事组织，本质上是西方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是为了遏制苏联而结成的军事联盟。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在政治上的对抗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事实上，美国没有因为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政府宣布进行西方式的民主改革便消除了安全方面对俄罗斯的疑惧。近年来，美国国内有关北约东扩的争论相当多，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但这些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认为俄罗斯未来的对外政策是不确定的。认为俄罗斯的未来捉摸不定。事实表明，仍然将俄罗斯看作一种潜在的威胁是美国推动北约东扩的重要原因，而且这还决定了美国在与北约东扩有关的一些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想一想，俄罗斯保留的3000多枚核弹头，即它仍具有将美国所有重要城市和工业区摧毁好几次的力量，而且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具有这种能力的国家，便可以明白，为什么美国执意要北约东扩。在北约成立之时的美国领导人认为，北约成立除了要遏制苏联扩张外，还要通过军事威慑来影响东欧的形势，所以当苏联解体后，美国并无意放弃利用北约影响那里形势的愿望。而且近年来的形势也为北约东扩提供了很多理由，如一些国家政局不稳和左翼力量回潮、动乱和种族冲突，特别是前南斯拉夫地区长达数年的战争等等，

在美国领导人看来，只有将北约向东扩展，才能确保这一地区的民主改革不致于倒退；这一地区国家间的纠纷不致于蔓延或引起大国的冲突，像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发生过的那样；俄罗斯的势力不再能卷土重来。

总而言之，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积极地促成北约东扩。

在北约东扩中，俄罗斯的因素虽然不是北约加快东扩速度的唯一动机，但肯定是其中最重要的考虑，换句话说，俄罗斯的形势和他的内外政策的变化，以及它与西方越来越多的矛盾，从反面刺激了北约东扩意图的明确和加强。而从另一方面看，俄罗斯就其影响、作用和价值对西方都显得特别重要，因此，俄罗斯对东扩的阻力，虽不能阻止北约东扩，也不能使东扩的进程放慢，但至少也会影响西方在扩大“冷战胜利成果”时的政策。

影响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俄罗斯向何处去。尽管俄罗斯的民主派试图给予保证，但目前为止答案不能令人满意，俄罗斯的不稳定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核扩散、民族冲突、难民外流等等令西方忧心忡忡，西方不准备给俄罗斯他所期待的大国地位，俄便准备自己来实现他，比如加强对独联体地区的控制，推动与中国等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并通过出口军火和某些高技术来解决资金困难，而这些出口对象也包括那些美国所不信任的国家。俄罗斯这些对外政策的变化，又进一步加强了西方对他的不信任感，二者的矛盾就这样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北约东扩计划也因此而产生和不断发展，由此又导致了双方在欧洲安全格局上的斗争。

在欧洲建立均势是俄罗斯外交的传统和指导思想。在力量削弱的情况下这对于俄罗斯的安全保证就显得更加重要，俄认为，北约东扩不仅破坏了其在欧洲实现均势的计划，而且对俄具有灾难性的影响，第一种影响是直观的，也是俄罗斯各种政治力量对东扩最本能的反应，这便是东扩威胁了俄罗斯的地域安全，东扩针对的正是对于俄罗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安全带，使俄西部边界直接面临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的压力，第二种影响是潜在的，然而却可能是最关键的和最深刻的，不仅关系到东扩，实际上也关系到俄罗斯的发展方向，俄民主派们认为北约东扩意味着在俄西部建立起一道“柏林墙”，阻断了俄罗斯向西方化发展。

冷战后最先提出加入北约的是东欧国家，东欧为什么急切地希望加入北约，为什么他们首先成为东扩的对象是北约东扩中的重要问题。由于东欧在地理上的特殊地位，它是西欧向东扩展的基地，也是俄国进入欧洲中心的跳板，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欧洲外交、军事和政治斗争的舞台，是欧洲列强的争夺对象，从未摆脱过在安全上依附某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命运，再由于东欧国家领土、民族纠纷复杂，列强势力的此消彼涨导致该地区领土变更频繁，东欧国家之间、它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领土矛盾至今也未完全解决，这种情况多次导致危机局势，也迫使东欧国家在安全上寻求强国或强国集团保护，历史上沙俄在东欧的侵略、干涉和统治使一些东欧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反俄心理，他们渴望加入北约。

北约东扩为未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投下一个大的变数，也会成为战后新东西方关系中的一大悬案，未来的局势发展变化莫测，俄罗斯面对北约东扩，基本上是理性应对的，而且，可以认为俄罗斯在北约东扩的谈判中获得了与其实力相称的收益。虽然北约与俄罗斯达成了一种制度性的妥协，但俄罗斯仍将东扩的北约看成是古荷马史诗中特洛伊之战中立下神功的木马，双方根本的政治利益上的差异或冲突并未获得最终解决。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搞了一

个联盟宪章，当时也把西方吓了一跳，但俄罗斯并未想建立一个新帝国，只不过是一方面用它来缓冲一下北约东扩的冲击力，另一方面对国内压力交待一下罢了。

欧盟“新地中海战略”

冷战结束后，欧盟在实施“东扩”计划的同时，又挥师“南下”，制定了所谓“新地中海战略”。主要包括：政治和安全伙伴关系，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同种族主义作斗争，防止核扩散而定期进行政治对话等；经济和金融伙伴关系，欧盟将通过增加经济援助，帮助地中海国家加快经济发展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确定双方未来合作目标，即于2010年建立欧盟——地中海自由贸易区；社会和文化关系伙伴关系，涉及到控制移民，打击犯罪以及同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活动作斗争等方面的内容。欧盟的这一“南下”计划已经付诸行动，并且取得了一定进展。

1994年10月，欧盟首次提出同地中海南岸国家建立“伙伴关系”的倡议。年底这一倡议得到欧盟成员国首脑会议的一致通过，并很快得到地中海南岸国家的广泛响应，欧盟的“新地中海战略”由此出台。1995年11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一次欧洲——地中海27国首脑会议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发表了共同宣言。根据“宣言”确定的目标，双方将建立一种更加紧密的“新型伙伴关系”，使地中海地区成为一个和平、稳定的繁荣区。双方一致认为，这是一项“头等重大的事件”，是“建设稳定、合作和安全的欧洲与地中海空间的历史性机会”。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近两年来，欧洲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工程，首先，欧盟加快与南岸国家签署联系国协议的谈判进程。第二，加强与申请加入欧盟的地中海国家的谈判进程。第三，召开欧洲——地中海国家首脑会议。第四，建立定期政治对话制度。于1994年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了“地中海对话和合作论坛”，1995年的第二次会议确定“论坛”的宗旨：“就地中海沿岸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非正式对话”。“地中海论坛”已成为当今地中海南北国家高层领导人进行定期对话磋商的重要场所。

从上面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欧盟的“新地中海战略”出台时间虽然不长，但正在一步一步地取得进展。欧盟在冷战结束后推行的这一战略有一特殊的政治背景。首先，欧盟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地中海地区是欧盟的南大门，是当代世界暴力和武装冲突比较集中的地区。地中海南岸国家形势动荡不定，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对地中海南岸地区的战略需求下降，力量收缩，使地中海南岸地区在冷战时期掩盖的各种内部问题日益突出，民族、边界矛盾和冲突不断发生，各种宗教狂热、恐怖活动、暴力事件、非法移民等已殃及欧盟南部成员国。从而对欧盟的稳定以及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构成直接威胁。欧盟为求取自身的安全和发展，迫切需要在地中海地区建成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其次，欧盟希望能够取代美国，夺取地区主导权。冷战结束后，美苏在该地区的对抗，争夺局面已不存在。对美国来说，地中海地区的地位随着下降，它的力量处于逐渐收缩的态势。在这个背景下，欧盟则借助于地缘上的优势趁虚而入，快速出击，力图排挤直至取代美国，将该地区纳入它的势力范围，以扩大欧盟在该地区的影响，发挥欧盟在该地区的主导作用。再次，欧盟企图以“南下”平衡“东扩”，缓解欧盟内部矛盾。随着东欧剧